

案卷里的

青島

刘宗伟◎著



案卷里的

青島

刘宗伟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案卷里的青岛 / 刘宗伟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552-3824-9

I . ①案… II . ①刘… III. ①青岛市—地方史 IV. ①K295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87447号

书 名 案卷里的青岛

著 者 刘宗伟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董建国

装帧设计 李开洋

平面制作 青岛翰墨杰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炜瑞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10mm × 1000mm)

印 张 28

字 数 4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824-9

定 价 58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印刷厂服务电话：13864837986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：文史类

目录

第一篇 名人踪迹 / 001
叶世克的“丰碑” / 003
周馥的青岛之行 / 021
特鲁泊的济南回访 / 033
卫礼贤的背影 / 047
亨利亲王和卫礼贤在即墨大集的身影 / 071
寻找谭岳峰 / 081
孙中山访问青岛 / 093
王芃生与青岛回归 / 101
报人胡信之之死 / 119
葛光庭的青岛岁月 / 133
熊希龄的青岛之憾 / 153
沈从文重返青岛 / 167

第二篇 史事钩沉 / 175

德军胁迫清廷“许展沂路” / 177

消失的叶世克纪念碑 / 185

卫礼贤笔下的青岛易手 / 201

接收青岛如临大敌 / 219

招抚孙百万 / 233

“祥子”罢工 / 257

被遗忘的警察公墓 / 283

攀辕挽留沈市长 / 299

“淘宝”铁展会 / 315

第三篇 战前印记 / 325

端木蕻良：恐慌的“青岛之夜” / 327

老舍：悲怆的青岛战前记忆 / 339

斯诺：青岛采访“焦土抗战” / 351

第四篇 旧报新读 / 357

青岛民众悼念孙中山 / 359

满纸“亲善”荒唐言 / 369

沈鸿烈的青济行踪 / 381

美国水兵刺死青岛“祥子” / 395

司徒雷登视察青岛 / 413

脆弱的灵山堡垒 / 425

第一篇

名人踪迹

叶世克出任胶澳总督不久，以高密人孙文为首的胶济铁路沿线乡民，掀起了抵制铁路修建运动；而鲁南地区的乡民，则抵制德人对矿山的勘查和开采。乡民与“拳民”汇成一流。

兵戎相见，血腥镇压，成了叶世克的新使命、贴在他身上的“标签”。

叶世克的“丰碑”

1899年2月19日，德意志帝国海军上校叶世克抵达青岛，出任胶澳租借地第二任总督。

1901年1月27日，叶世克病逝于胶澳野战医院（今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），身后哀荣备至——2月8日，胶澳当局为其举行隆重葬礼，将这位“最严峻时刻的坚强有力而且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”安放于欧人公墓（又称万国公墓）；山东巡抚袁世凯委托即墨县知县王万甡来到叶世克灵前，代其宣读祭文，极尽溢美、谄媚之词：

皇皇使节，旌旆飞扬，怀柔道备，辑睦才长，望隆岱岳，
品重圭璋。有为有守，知纪知纲，德浮海甸，威振遐荒，恩周
庶业，泽被官商，造万民福增。□上国光，倾心数载，同事一
方，水溶胶洽，诸荷匡襄。将星忽陨，大雅沦亡。同深惋惜，
曷胜悲伤！爱洁酒醴，爱荐馨香，爱命属吏，代致哀肠。灵
魂有知，来格来尝。制军遗范，万古流芳。（注：祭文刊载于
1901年3月28日《胶州报》，字迹模糊处用“□”代替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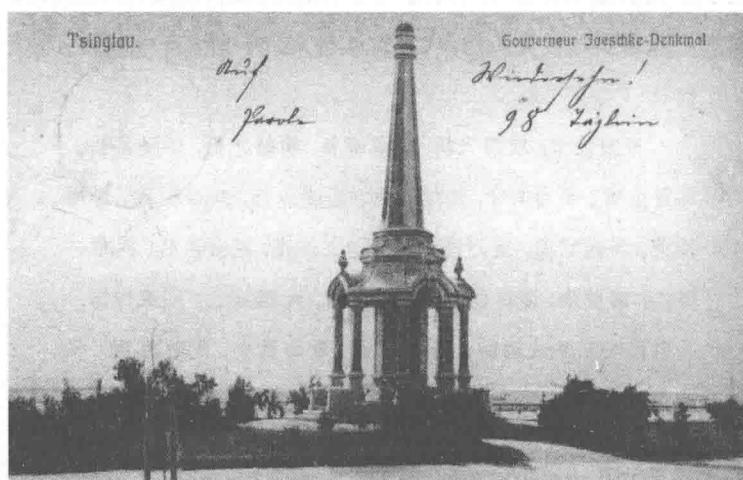
为彰其殖民“业绩”，胶澳当局受帝国之命，在威廉皇帝路（今太平路）口海岸线处为叶世克建造纪念塔一座，并将纪念塔东南向的海角命名为叶世克角。1903年3月，锥形的叶世克纪念塔建成；1904年3月6日，青岛大港竣工仪式上，德国将为青岛建造的第一艘船命名“叶世克总督”号，该船后由亨宝轮船公司经营，每周由上海至青岛往返一次。

虽然在胶澳租借地执政不足两年，身世、履历、性情、喜好鲜有记载，但从现存的档案史料中仍可“析出”叶世克——一个刚愎、凌厉、动辄以枪炮解决争端的喋血军人。

叶世克擅于以武力解决与中国人的争端，除个性强硬使然外，与其所处的时局不无关系。

德占青岛十七年间，先后经历四任总督，而其对应的是13任山东巡抚。13任封疆大吏中，以袁世凯为分水岭：袁氏之前，李秉衡、张汝梅、毓贤信奉“以民制夷”；袁氏上任后，力避武力冲突，以约章行事，同时兴办洋务，与胶澳德人展开经济竞争，也就是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中力倡并渐成主流的“商战”。其后的周馥，则首度出巡胶澳，与德人进行外交对话。继任者多效尤。

叶世克出任胶澳总督不久，抵制胶济铁路修建、矿山开采、宗教传播的乡民与“拳民”（义和团）汇成一流。



明信片上的叶世克纪念碑
青岛（1907年11月20日）
→德国

兵戎相见，血腥镇压，成了叶世克的新使命、贴在他身上的“标签”。

“占地毁坟” 筑路冲突不断

实际上，对于修筑胶济铁路引发沿线居民的抵抗，早在1897年11月14日占领青岛前夕，德国人就有所顾虑：那些坟丘内“沉睡”的中国人，或许就是修筑铁路的最大阻力。

1897年8月，德意志著名水上建筑技师、基尔港建港监督官弗朗裘斯，向帝国提交了他此前潜入胶州湾一带详尽调查后的报告，其第二十五部分竟然是“坟墓问题”：

在（胶州）湾的周围有许多中国人的坟墓，必然难以处理，幸而多处坟墓集中在一处墓地上，但也有些是分散各处的。在铺设铁路等等时，必须选择坟墓不多的地方……

在今天看来，德国人的顾虑符合大清国情、民情。因为一则害怕移坟、征地、拆迁等改变风水的“猛药”引发乡民暴乱；二则担忧主权问题，虽有李鸿章等“放眼望世界”的股肱之臣，围绕国防、转运、邮政、矿务等一直“极陈铁路之利益”，但晚清时期铁路建设仍步履维艰。

自德意志帝国组建山东铁路公司并开展试钻和地形勘测起，胶济铁路沿线高密乡民与铁路公司的摩擦冲突就接连不断。

高密市档案馆现存的档案史料，碎片化地记录了高密乡民与德方冲突的原因、过程。

民国十七年《胶澳志》载：“（德人）‘迁坟移舍，尤为乡民所不乐为’，起初，（德方）规定偿以迁移费，但为降低铁路造价，迁移费一减再减。这点少得不能再少的迁移费，那些中间人也不放过，常常据为己有。其后，德人甚至肆行拆迁农民屋舍，铲除农家

坟墓，却不再偿付费用。”

因为“强行筑路，占地毁坟”，1899年6月上旬，高密城东10华里处的姚哥庄乡民，与来此勘路插标的德人率先发生冲突。

6月18日，大吕庄一带乡民组织起来拔除路标，并群起殴打前来制止的路员、翻译，围攻设在姚哥庄的德人公司分部。

此次冲突事件，1900年4月12日，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折“办理高密县民阻修铁路案进呈铁路章程”、上海《德文新报》均有记录。

袁世凯奏折中分析了乡民阻止修建铁路原因，章程缺失系主因：

德国在山东省建造铁路及铁路附近之处开采煤矿，均应另立详细章程，而此项详章迄久未定。德人特无钤制，往往恣意横行，加以东省风气未开，民情强悍，龌龊生事，时所不免。

对于与高密乡民的冲突，德人在档案中称之为“骚乱”。时任驻华公使克林德，在致德国外交署国务秘书比洛的函中，一语中的直指“骚乱”诱因——“由铁路铺设过程中的粗暴行为引起”。

根据德国档案馆馆藏史料，德国汉学家余凯思写就的《在“模范殖民地”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——1897—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》一书中，悉数了山东铁路公司种种“粗暴行为”：农民卖地所得远远低于平均价格的补偿金；铁路公司不愿花时间逐个澄清颇为复杂、难以决断的土地占用关系，甚至未等购买事宜了结就破土动工；土地征购款支付不及时，且要扣除名目繁多的大笔行政管理费；铁路公司招募的工人来自北方，他们经常行骗强奸当地妇女，有公司包庇，很少受到惩罚。

1850年8月，英国人在上海创刊的《北华捷报》周刊，在1899年至1900年胶济铁路沿线乡民与铁路公司频频发生摩擦时，“铁路



高密火车站

事件”报道连篇累牍，遂成卖点。

《北华捷报》在报道中，总结了高密人对待铁路的态度——他们宁愿什么铁路都不要；如果铁路非修不可，希望这项工作在对农民和庄稼的危害方面降到最低限度；为保证对财产危害程度最小，他们坚持主张雇佣当地人参加这个工作；他们反对从天津雇佣小工；他们要求在铁路穿越的低洼地带做好充分的排水准备，因为这些低洼地带曾是沼泽地。

给中国居民“上一堂教育课”

筑路受阻后，山东铁路公司青岛总办锡乐巴迅疾从青岛赶赴高密，要求知县葛之覃“补复标杆，查办殴工之人”，葛“置之不理”。锡乐巴遂折回，向胶澳当局请求军事干预。未向柏林请示，叶世克擅自决定出兵平息。

事后，叶世克在致帝国海军署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列举了五点理由：高密位于中立区，胶澳有权调动军队。这一权力须时常加以利用；必须给中国居民“上一堂教育课”；现在就采取强有力的镇压手段，可以阻止以后此类事情发生；应以迅速出击的方

式行动，否则中国会把驻扎租借地周围的军队集结起来；铁路建设刻不容缓，因为它直接影响胶澳租借地利益。

6月22日，叶世克以“拔标阻工”“保护路务”为借口，遽派德兵“星夜开往高密”。

24日，德兵进入高密胶州交界、高密县城东南25华里的芝兰庄村，在镇压当地村民反抗后，德兵一路西行，进入离县城18华里的堤东村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堤东村89岁的宫述连在高密政协文史资料中，回忆了当时的场景：堤东村留有咸丰年间地主武装抵抗捻军而建的完好围墙（注：绕村修筑的土墙），乡民以此为屏障，并架设土炮、地枪，还悬挂起团练局红旗。

对此，率80名海军士兵、15名骑兵进逼堤东村的德军上尉毛威，也在德国档案史料中留有印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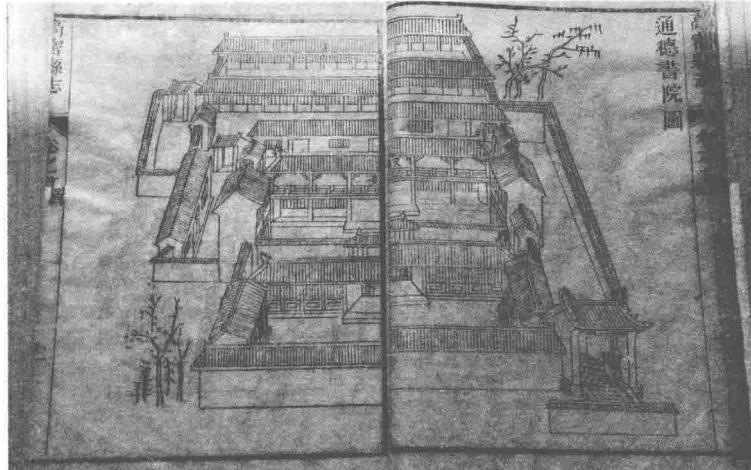
我试图让翻译慕兴立与村里两个首领谈判。他们应我的要求，从围墙后面走出来。我让他们明白，我并不怀有恶意，只要他们不再进行反抗……然而，他们轻蔑地向我展示手中的武器，指给我看他们防卫森严的村庄，并且说如果想到高密去，应当走另外一条路，他们是不会给我们开门的。

接下来的场景不言自明——毛威恼羞成怒，下令向村庄发起攻击。“中国方面共死亡17人，受伤者未加统计。”毛威向叶世克汇报，“顽强抵抗是由招募来的雇佣兵进行的。”

《胶澳志·大事记》对此的记录是：“堤东等地群众武器阻路，德兵遽往开枪，杀伤甚众。”

由于县令葛之覃麻痹大意，未作防备，德兵轻松入高密城。《山东时报》记录了这一过程：25日，德兵自堤东村起程，当日已刻入城。

进城后，德兵强占高密通德书院，“致使书院器物毁坏无存”



高密通德书院图（翻拍
自高密市档案馆）

（袁世凯语）。同时，德兵又向高密城乡各团局、民舍搜查枪械，以致“团局枪械搜刮殆尽”。

被胶澳当局蔑称“行事鲁莽的满人”——山东巡抚毓贤闻讯后，指示莱州总兵彭金山率部奔赴高密。28日，200名清兵抵达，毛威向彭金山发出恐吓：“高密属于中立区，中国军队在这里出现不符合租借条约规定，如不撤离，将会发生‘严重后果’。”

迫于德军威力，彭金山擅自下令撤兵，毓贤对此十分不满。

“当令国势日坠，由于民志未伸。如今再杀拳民，无异于自剪羽翼，而开门揖盗也。”毓贤写道。此时，毓贤将目光投向了义和团，并寄望殷殷。

29日，驻高密德兵在叶世克授意下，要求清政府付给赔款：“大吕庄案议赔铁路工费、兵费银3495两，限7月1日付清。”同时，德人还将其所拟“莱州境内路务权宜办法合同章程”（共计十一条）送至，云“照此议订，兵即撤离”。

7月8日，赔款、“十一条”章程兑现后，德兵“全回青岛”，“高邑铁路时下又兴工”。

叶世克派兵镇压堤东村民众，胶澳总督府编写的《胶澳发展备忘录》（1898年10月—1899年10月）中也有记录：“6月份，向高密派出了一支由海军第三营的两个连、四门野战炮、两挺机枪和15

名骑兵组成的远征队，以平息那里爆发的袭击德国铁路修建工作的骚乱。远征队攻克了遭遇抵抗的堤东村，在林哥庄（注：应为芝兰庄）附近也有短时间的战斗。德国方面没有任何损失。那里恢复了平静后，远征队7月份返回青岛。而一支骑兵巡逻队在胶州一直驻扎到1899年8月底。”

当然，在高密乡民殊死抗争、清政府协调争取下，德人也作出让步，“以泯前隙”。主要包括：拿出2000万抚恤死伤乡民，同时，对填筑路基所需泥土挖掘、修路所购田地中成熟农作物的补偿、铁路公司所雇华人寻衅滋事处理等均一一作出详细规定。

比如，“购地时，如地内所种粮物不久成熟或尚未成熟，公司亟须交地不及收割者，应于地价外酌估粮物所值之价，一并核发，以示体恤”；“筑路插标如有踏损民地所种粮物，酌量赔偿”；“填筑地基所需泥土，须向远处购取，不得在附近田地内任意掘用，以启争端”；“公司所雇华人，如有调戏妇女，应送地方官惩治”。

德兵已撤，“铁路又兴工”，袁世凯仍忧心忡忡。

“伏查高密阻工一察，屡经反复，迭费周折，几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”，在奏折中，袁世凯支招：为善后之计，惟有妥订章程，使彼此均有遵守，渐杜纷纭。为此，他多次与叶世克商量，请他派代表来济南巡抚衙门议定章程，同时奏请清廷派记名副都统、在奥地利军队学习时与德皇太子威廉同伍、曾任大清国驻德公使馆翻译的荫昌来山东赞佐。

1900年正月28日，新年喜庆气氛尚存，叶世克委派的代理商谈交涉的武员布德乐、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一行抵达济南，“交涉路矿各章，屡议屡改，商至两旬之久，始先后议定交涉章程七款，煤矿章程二十款，铁路章程二十八款，惟铁路章程已由锡乐巴在省押定施行”。

白纸、黑字、朱印，锡乐巴与中方代表虽已签字画押，但仍难拂去袁世凯心中的隐忧，“该路由胶至济七百余里，将来能否节节顺手，究难予知”。



山东铁路公司青岛总办
锡乐巴（王斌提供）

有学者评价称，山东与胶澳签订的《筑路善后章程》，将帮办和保护铁路之责全部加到了地方官身上，却没有赋予中国方面对铁路的控制权，对铁路公司也未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。因此，这份章程没有实质性成果。

“惩罚性军事行动”

尽管有“十一条”、有《筑路善后章程》二十八款，双方也各自作出让步，但随着胶济铁路重新开工，新的冲突又起，而且对抗的乡民中有了义和团的身影，因此冲突激烈程度前所未有。

余凯思在《在“模范殖民地”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——1897—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》一书中，分析了冲突的主要原因：“受铁路地基影响，居住在高密西乡低洼处且受洪水泛滥之害的居民提出多建涵洞，铁路公司以没必要和花费太大为由拒绝。于是，反抗铁路铺设的抵抗在1899年底和1900年春天爆发了。”

对此，《胶澳发展备忘录》（1899年10月—1900年10月）轻描淡写：“1899年末，局部地区发生了干扰筑路的行为，主要借口称老百姓不同意线路走向。经过仔细调查，我们认为，这些理由几乎没有根据，有人在背后恶意煽动。”